

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译丛·学术名著系列

行动与世界体系

〔法〕蒂埃里·德·蒙布里亚尔 著
庄晨燕 译

L'action et le système du mond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行动与世界体系

〔法〕蒂埃里·德·蒙布里亚尔 著
庄晨燕 译

L'action et le système du mond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5-579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动与世界体系/(法)蒙布里亚尔著;庄晨燕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

(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译丛·学术名著系列)

ISBN 978-7-301-12717-9

I. 行… II. ①蒙… ②庄… III. 国际关系学-理论研究 IV. D8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38860号

L'action et le système du monde

1^{ère} édition « Quadrige »;2003, octobre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2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法国大学出版社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书 名: 行动与世界体系

著作责任者:〔法〕蒂埃里·德·蒙布里亚尔 著 庄晨燕 译

责任编辑:徐少燕

封面设计:春天书装工作室 www.ct1900.com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2717-9/D·1860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2.75印张 369千字

2007年9月第1版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出版者言

我们一直在呼吁建设独立自主的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科,但在全球化思潮的影响下,学科交叉如此频繁和复杂,实现国际关系学学科的完全自主似乎已成为不可能。但是,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学科建设依然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业。为了推动这项事业,我们采取原版影印的方式,组织引进了一批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科领域颇有影响的国外(主要是美国)教科书,也就是我们已经出版的《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原版影印丛书》。在推出那套影印丛书的同时,我们还选择了一批最有影响的学术经典著作,推出了一个影印版的《学术精品系列》,与原版教科书共同构成了一个原文教学和科研的参考大系。

如今,我们在这个大系的基础上,再推出一个翻译版的大系,即现在的这个《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译丛》。目前我们把这个译丛分成两个子系列:一是《经典教材系列》,一是《学术名著系列》。

《经典教材系列》着力引进国外著名的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专业的大学教科书,按照其侧重点的不同,分别涉及世界政治(或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外交政策等,以期对我国现行的高校教科书体系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同时也起到对照和激励的作用。因此,我们在选择国外教科书时奉行的宗旨是:服务于我国高校的教学和学科建设,向广大大学生和更多读者提供最具亲和力的专业读物。当然,我们的态度以及我们所倡导的态度始终是“拿来主义”的,绝对不主张照搬照抄国外的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国外教科书有其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注重基础、亲和力强的特点,这是我们应该借鉴的,但也有一些弱点,比如主要针对的是其本国的大学生,而且往往带着发达国家的政治“有色镜”,这些都需要我们在阅读和使用加以分辨。

《学术名著系列》则重点选择本专业领域内的名家代表作,侧重学术性、专业性,但不唯流派、不倡门户之见,坚持开放性和多元化的原则,让国内的学术界了解到国外国际关系学术界“百花齐放”的特征,从中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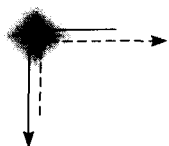
魅力、体悟精华、掘采灵气,以期对我国的国际关系学术发展起到启迪思维、放宽视野、见贤思齐的效应。因此,我们在选书时既优选长盛不衰的大师经典,也青睐学术新秀的最新开拓;既聚焦于声名远播的方家文墨,也不拒绝学界“孺子牛”的真心书写;既热衷于那些坚守学科自主的佳作,也投好于那些跨越学科篱墙而独树一帜的名品。当然,学术的限度永远存在。学术著作应该是开启智慧的钥匙,而不应该是束缚思维的绳索,我们引进国外学术名著的意旨和诚界也在于此,故亦请读者明辨。

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尤其是其基础部分,更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这项系统工程的一小部分,希望有更多的教员和学生以及更多的出版界同仁参与到我们的这项工作中来,共同把我国的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这门学科推到世界水平上,不仅在世界上创出更多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学术成果,而且搭建一个供各国学界同仁交流的学术舞台。

希望我们的呼吁和努力一如蓝天鸽哨,长久地留响于读者诸君的心际!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3月1日



中文版前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政治单元,因此,中国人思考权力现象的历史最悠久,任何一个外国人都无法在这方面向中国人传授真正新颖独特的知识。这一点如今更加显而易见,因为近三十年来,“中央帝国”的经济持续发展,速度惊人。直至今日,中国政府展现了成功领导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变革的能力,它充分意识到变革带来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并努力去解决。我们对于已经取得的成就由衷地感到钦佩。

我希望,中国政治学、国际关系、社会学、经济学或战略领域的学者和研究人员甚或将这些学科应用于实践的某些行动者都能认为本书对他们有用。我试图创建一种综合性理论,用于分析各种性质的有组织的人群的行动,为此,我借鉴了内容广泛的众多研究成果,当然大部分来自西方学者。该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是“行动单元”。行动单元是由共同文化和组织维系的人群,组织保证了行动单元内部的运作和对外的行动。政治单元是一种特殊的行动单元,特点是自认为至高无上。不同行动单元之间相互作用,它们的互动产生了“实践学问题”,尤其是经济、政治或国际问题。我在构建理论时主要参考了当代数理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这是我刚开始职业生涯时研究的领域。基于行动单元的研究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将往常不相干的领域关联起来,从而使对于各种权力实施情形的分析更加丰富。我希望这种关联的成果不仅体现在纯思维层面,而且能够帮助各领域的战略家在具体生活中更好地采取行动。

如果中国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萌发了将我的研究模式与他们自身采用的模式进行比较的愿望,那么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就达到了目的,因为他们的模式源于所在的文化,相互比较就朝着更大范围的统合迈出了



一步。

我不认同令塞缪尔·亨廷顿声名鹊起的文明冲突理念,相反,我相信,以互补但不抵触的角度观察相同的普遍性问题能够带来丰硕的成果。一般而言,比较总是直觉和知识的源泉。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同样不仅存在于思维领域。本书花大篇幅论述了政治的道德层面和全球化现象。我有意将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因为随着历史的加速发展,地球变得越来越小,所有这一切都使得那些大行动单元,首先是主要的政治单元越来越会对整个地球产生影响、改变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人为因素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都是如此。今天,地球上主要政治单元之间关于这类问题的讨论在行动层面几乎不见成效,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个共同的概念框架来分析这些问题。而这样一个框架能否存在取决于不同文化之间成功的相互渗透。我希望本书所阐述的研究模式足够灵活和开放,尤其是对作者所在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足够尊重,从而为文化之间的成功渗透提供便利。因此,我对中国读者满怀期待,希望听到他们的批评。

最后谈谈本书的翻译。我知道,由于本书使用的术语来自为数众多、有时甚至相距遥远的不同学科,翻译起来不会很容易,而这样的书如果译得不好会让人根本看不懂。可惜我本人无法亲自鉴定本书的翻译质量,但我完全有理由对此充满信心。因为庄晨燕女士对欧洲文化特别是法国文化的感觉非常好,而且在人文科学方面拥有较宽的知识面。她的聪慧以及迅速弥补自身不足的能力让我印象深刻。我不仅感谢她的翻译工作,而且感谢她以自身的例子表明,文明的统合是可能的。

蒂埃里·德·蒙布里亚尔

2007年4月

哲学家的沉思,是离开熟稔回到陌生,在陌生中面对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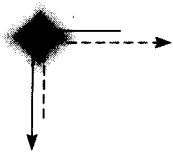
——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

人类发明了命运,以便将世上一切无序归咎于它,而人类的义务是治理世界。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我总是希望改变世界,改变生活。我一直是一个令一切糟糕的、僵化的机构头痛不已的改革者。

——洛朗·施瓦茨(Laurent Schwartz)



« Quadrige » 丛书版序言

本书受到的欢迎使其能够迅速再版,我也因此有机会澄清评论家们提出的某些问题。多位作者都对使用从宇宙天体学借用的术语——世界体系(système du monde)以及该术语的和平内涵感到吃惊。我引用皮埃尔·阿斯奈(Pierre Hassner)的评论^①:“尽管[蒙布里亚尔]强调时间维度的重要性并提供进行相关研究的重要元素(如稳定的数学定义或分叉概念),但对于均衡和节制的偏好以及乐观主义倾向妨碍他深刻地关注消极进程(processus négatif)、突变效应(effets pervers)、恐慌、解体、军备竞赛或价格竞赛,即拉波波特所说的‘理查森进程’(processus à la Richardson)所包含的内容。虽然他对于克劳塞维茨的著述烂熟于心,但在克氏理论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的趋向极端(montée aux extrêmes)和激情效应(rôle des passions)只是被一带而过。我们可以希望;作者在下一本书中会讨论时间或历史维度,但我们也可以担心,在下一本书中,噪音和狂热,疯狂和灾难将再次由于保守的谨慎或理性的乐观而被牺牲。”本着同样的精神,泰蕾兹·德尔佩什(Thérèse Delpech)指出^②:“天文学和政治学之间的落差[……]或许从来没有如此之大。理解当下,尤其是预测未来,从来没有如此之难。我们可以说正在摸着石头过河,意外接连出现;我们被事件牵着鼻子走,丧失一切控制力,特别是我们根本无法预测它们的发生:亚洲经济危机、印度核试验、印尼苏哈托政权倒台、纽约和华盛顿遭受‘9·11’袭击。现在,这一切发展到极致,美国资本主义在

XI

① « Deux mathématiciens auscultent le monde », *Critique internationale*, n° 18, janvier 2003.

② 书评, *Politique étrangère*, n° 3/2002。

巅峰时刻面临严峻危机。我们似乎离各种天体很遥远！而且，将系统概念应用于人类事务，特别是人类行动，这个理念本身总是有些令人怀疑：自由带来的更多是无序，而不是系统。”

皮埃尔·阿斯奈引用阿纳托尔·拉波波特 (Anatole Rapoport) 时指的是英国学者刘易斯·弗赖伊·理查森 (Lewis Fry Richardson) (1881—1953) 的研究。这位杰出的气象学家和和平主义者将学术生涯的一部分贡献给战争现象的研究。作为第一个用微分方程建立国家间互动模型的学者，他使用的方法之前已成功应用于众多物理—化学或生物学系统，其中尤以力学方式表现“军备竞赛”为最。根据初始条件和参数 (系统的结构)，我们可以得出趋向均衡的会聚轨线或与此相反的发散轨线，后者一旦超出我在本书中所说的模型的效度域限 (domaine de validité du modèle)^①，就可能导致一场“战争”。70 年代，借助于微分博弈论 (théorie des jeux différentiels)^②，上述方法在各领域广为普及。由此产生的所有模型的主要意义在于，模型本身蕴含着导致崩溃的潜质，从而表明治理不当可能会造成的后果。还不止如此。按照理查森的观点，我们应当尝试改变系统的结构，以保证系统的稳定，即避免轨线的爆炸性发散。但这里的“我们”是谁？依据本书的术语，治理的部分内容就在于构建一系列行动单元，这些单元的合目的性正是达到上述结果，更普遍意义上，正如第五章所做的解释，归根结底，为的是保证系统的结构稳定。事实上，我们可以将理查森看作军备控制的一个先驱，而军备控制确实在苏联解体之前保证了两极体系的真正稳定。

塞尔日·叙尔 (Serge Sur) 像大部分读者一样，在我的书中重新看到“雷蒙·阿隆 (Raymond Aron) 关心的问题，但更偏向和平、合作与寻求和谐，而不是冲突”^③。布朗迪内·克里格尔 (Blandine Kriegel) 呼应他们的观点，在法国文化台 (France Culture) 提出如下疑问：“依据斯宾格勒 (Spengler) 和德国政治哲学的传统，我们在卡尔·施密特 (Carl Schmitt) 身上可以重新发现这个传统，所有文明和国家必然与帝国、战争相连。而您在分析国际关系时强调的是与和平相关的现象。譬如，您说：今天

① 理查森在 1939 年出版了关于战争的数学理论，标题是 *Generalized Foreign Politics*。参见 Anatole Rapoport 在 1968 年出版的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中关于 Richardson 的词条。

② 我们可以在 R. Aumann et S. Hart (dir.), *Handbook of Game Theory*, vol. 2, North-Holland, 1994, chap. 29: «Game Theory Models of Peace and War» 中找到有关这些研究的阐述。

③ 书评, *Annuaire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vol. 2002, Bruxelles, Bruylant.

国际关系体系在寻求什么呢？公共利益，谋求安全，安全的需要是所有国家利益的根源所在……在您看来，安全政策和实力政策的区别何在？因为直到今天，人们依然主要从实力的角度来思考世界体系。”^①克里斯蒂安·施密特(Christian Schmidt)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同样的问题：“蒙布里亚尔勾画的实践学和阿隆的实践学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赋予历史何种角色。阿隆认为，[……]历史对应着一个理解的特殊层面[……]。XIII 蒙布里亚尔更喜欢将逻辑实证主义的类别挪到实践学中。”^②

讨论更具体的问题之前，我首先就系统概念谈几点，没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系统概念的核心在于一个由明晰可辨的不同客体组成的相互依存的整体，这种相互依存性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概率来描述——即使不能做到完全描绘——其主要特征(参见第十四章)，从而保证一定程度的可预测性或可控制性。不应将系统概念与系统的特殊限定(déterminations particulières)尤其是数学限定混为一谈，也不应与某个观察尺度混淆起来。决定性系统只是一个特殊的类别。处于另一个极端的布朗运动经常被认为展示了“混沌”(chaos)的意象，即便如此，也可以对其进行一番非常精细的数学描述。1827年，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R. Brown)基于对气体或液体中悬浮细微颗粒的运动的观察，最早对这个现象进行描述。1905年，爱因斯坦第一个从热量的运动理论推演出对布朗运动的概率分析，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在1923年为该分析提供了坚实基础。大家很少提到，早在1900年，金融数学的天才先驱、法国学者弗朗索瓦·路易·巴舍利耶(François Louis Bachelier)就预想到了由此产生的理论，即在人类系统的框架下。^③ 将布朗运动推而广之的连续随机过程理论(théorie des processus stochastiques continus)在20世纪中期被经济学家频繁使用。更普遍意义上，我们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一个事实是：决策理论作为实践学(关于行动的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对于概率理念从最初到今天的发展贡献良多。

使用“世界体系”这个说法——人或更确切地说是“行动单元”是组成体系的部分元素——是追求一种言语的便利，它的优势在于简要地确定了实践学所处的环境。选择“行动与世界体系”为本书的标题，我希望突出第一版前言一开始就明确指出的一个基本事实：任何行动的合目的

① « Le monde et l'action », émission *Les vendredis de philosophie*, le 12 mars 2002.

② « La praxéologie en question », 即将在 *Le Débat* 杂志发表。

③ Louis Bachelier, *Théorie de la spéculation*, 1900; rééd. Jacques Gabay, 1995.

性——明示的或经常是暗含的——在于改造“世界”的一部分(大部分情况下是很小的一部分);即在最普遍意义上,改造“世界体系”本身的一部分。就本书着重讨论的国家(nation)间关系而言,我倾向于谨慎地看待“国际体系”(système international)这个常用表述,原因并非与预测性有关(一个系统的可预测性取决于观察的尺度和时间,就像物理学中的统计热力学一样,另外,显然还取决于系统的结构),而是由于这种表述的不精确。换言之,我认为不可能完全描述“这个”国际体系,它比国家间体系要丰富、复杂得多。相反,从行动单元概念和实践学问题出发,我们可以尽可能精确地讨论一类特殊的实践学问题,即“国际问题”,服务于现实的需要。

在可预测性方面,“世界体系”的说法没有什么特殊含义。它绝对不包含天体物理学蕴含的可预测性。关于这一点,还应当提到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在研究作为当代混沌理论基础的三体问题时提出的具有决定性的不确定性(incertitude déterministe)(确实在人类历史的时间段中很不明显),这提醒我们,没有理由将系统和无序对立起来。读者可能会放心或担心:我完全不试图消弭偶然,相反,偶然在我的研究中无处不在。尤其是,一旦发生“出轨”(sortie de trajectoire)或类似苏联解体的重大冲击(这两个概念可以相互关联),从一个系统向另一个系统过渡,组成新系统的元素以及这些元素之间的关系的形成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系统的概念在过渡阶段依然适用,但或许应当补充一个应用于中间系统本身的额外的不确定性层次(参见第六章)。上述情形与物理学中的不可逆性并非没有关联,这就让我们回到光阴、历史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参考伊利亚·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和伊莎贝尔·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s)的思考。^①

关于21世纪初的国际关系,我们能否认为,不确定性达到历史最高?我不这么认为。泰蕾兹·德尔佩什提到的所有事件都不是完全不可预测的,远非如此,即使这些事件在不同程度上使相关政府措手不及,尤其是“9·11”袭击。冷战期间缓慢形成的国家间体系与苏联和苏联帝国同时消亡,但还没有一个稳定而清晰的新体系来代替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可以用温和革命来形容的过渡时期。美国的实力减少了不确定性,所以只是温和的革命。历史提供了众多革命的例子。

^① 参见 Ilya Prigogine et Isabelle Stengers, *La nouvelle alliance*, Gallimard, 1979; et *Entre le temps et l'éternité*, Fayard, 1988。

相对于某个清晰的体系框架,革命时期大大增加了控制的难度,但并不是完全不可能。不同行动单元为了生存,必须单个应对极端风险,这对于它们面对可能完全没有准备情形时的适应能力是一个考验。某些行动单元解体,新的单元出现。具体而言,直到目前为止,后苏联过渡时期似乎并不是特别混沌^①(这里是布朗运动而不是庞加莱意义上的“混沌”)^{XVI}。“9·11”袭击令人震惊,加速了形势的演变,由于准国家(构成浮现体系的元素)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增加,这种演变趋势之前完全可以预测。但悲剧发生近两年之后,统计数据表明,恐怖主义在全球呈下降趋势^②,我们至少应当注意到这一点,尽管风险本身没有消减。2003年初,美国在伊拉克发动了一场原则上非常传统的战争,首要目的是废黜萨达姆及其政权。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一点,即它感觉自身更受冷战时期制定的游戏规则的影响(游戏规则的概念一般不能被简单归结为国际法——譬如实力均衡的概念)。美国尤其对未来与欧洲关系的性质产生疑问。我们可以对此感到担忧,特别是对布什总统表现出的某种麦卡锡主义意味提出警告。但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是体系之间过渡时期的典型特点,我不认为——或还没有看到——这构成一种预示世界末日的普遍的偏离。与此相反,战争结束两个月后,在占领伊拉克方面遇到的困难似乎已经促使美国政府更加谨慎,即更具预测性。这是一个临时的判断,显然需要调整。我在世纪之交的经济发展中同样没有看到出现新的极端形势的迹象。投机泡沫的形成和破裂,经济周期,偶尔出现的运行障碍和舞弊现象(安然公司事件),抗拒结构改革(欧洲、日本):所有这些是我们了解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很容易处理。

现在我更明确地回应皮埃尔·阿斯奈提出的“我对于均衡和节制的偏好”和我的“乐观主义倾向”。确实,我在本书中没有长篇论述“理查森进程”^{XVII}。这并不意味着我忽视它,我再次重申。它是集体悲剧和历史演变的基础。我们之前已经指出,在形式层面,最简单的系统也可能展现发散的轨线。在第六章中,我提到萨缪尔森的振子模型(modèle de l'oscillateur)(投资乘数和加速原理互动模型),这是与理查森同时代的研究。更近的经济学者著述提供了众多类似例子,解释各种“泡沫”的形成原因。我重申,发散轨线的特性在于令系统走向崩溃,就像遭遇了冲击,导致我称之为革命情形的出现。

① Thierry de Montbrial, *Quinze ans qui bouleversèrent le monde*, Dunod, 2003.

② *Patterns of Global Terrorism 2002*, 美国国务院报告。

我也正是如此描绘苏联解体后的世界。在极端革命期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过渡系统可能是完全无法了解即无法控制的。在某个阶段,可能完全无法预测替代旧系统的新的稳定系统会是怎样。本书的很多评论家都看到,我刻意与某些国际关系思想家保持距离,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国际关系中的非正常状态。我最关心的是实践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即如何在作出调整的同时——我甚至敢说,如何在前进的同时——不偏离方向,不失去控制?这就是为什么我偏好可被称为“移动”的均衡(équilibre « glissant »),即将稳定——某个系统的轨线的非发散状态——与系统面对影响自身的“冲击”不断作出的、明晰可见的调整结合在一起。这样的结合要求表现出改革的胆略,用皮埃尔·阿斯奈的原话来说是更多涉及理性的乐观,而不是保守的谨慎。我本人避免将这两者等同起来。如果理性的乐观指的是相信有可能通过改革而不是革命解决集体问题,那么我完全接受这个标签。有心的读者肯定会发现,改革—革命这对辩证关系贯穿全书始终,而且我从来没有停止对这个问题的思考。^①我完全同意亚历山大·阿德勒(Alexandre Adler)在之前提到的法国文化台组织的一次辩论中发表的观点:“克劳塞维茨或马基雅维里对于政治的信心,蒂埃里·德·蒙布里亚尔肯定将其置于工程师的艺术上,但这种工程师的艺术事实上完全是政治性的:它意味着为人类的不同活动构建居所,这些居所阻止人们在某个时刻放任自己采用时时呈现的非理性方案。”我确实坚信,如果我们不能建造这样的居所,那么人类将成为自己的掘墓人。这同时解释了我对历史的态度。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比政治学家更了解我的意图。^②像许多高中生一样,我过去也曾就保罗·瓦雷里的名篇《论历史》(*De l'Histoire*)特别是他的如下观点作过论述:“历史为人们希望的一切提供解释。严格地说,历史不会带来任何教益,因为它兼收并蓄,包含所有例证。”^③按照我所理解的有关行动的哲学和实践,历史作为案例分析的宝库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在我看来,本书所提供的基于行动单元和实践学问题概念的“工具箱”正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历史的框架。我认为,如果缺乏分析框架,瓦雷里的观点很难驳倒。历史本质上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发展历程,但分析工具属

① Thierry de Montbrial (dir.), *Réformes-révolutions. Le cas de la France*, PUF, 2003.

② 相关书评: Jean-Claude Allain, dans *Guerres mondiales et conflits contemporains*, n° 205/2002; Georges-Henri Soutou, dans *Revue d'histoire diplomatique*, n° 4/2002; Maurice Vaïsse, dan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n° 112, hiver 2002.

③ 参见 Paul Valéry, *Œuvres*, t. II, Gallimard, « La Pléiade », p. 935 – 937.

于不变量之列。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接受人们将我的逻辑贴上“忽略历史”的标签。确实,我对于试图通过直接解读过去来预测未来发展纲要. XIX 重要的历史哲学心存戒备,特别是当这种哲学让遭受老龄化困扰的人民更加悲观的时候。历史让人类的自由插上翅膀,这就是我所钟爱的历史观。

这些观点让我们再次面对时间问题。在科学领域,之所以会形成与直线或实数集合同构(isomorphe)的可测量时间概念,是因为有可能排列不同“事件”(时序)和成对事件(时段)。这里的“事件”应理解为人对于某个现象的任何客观表征。我们因此可以通过思维推断构建我所说的“准莱布尼茨时间”(temps quasi leibnitzien)^①,它具有关系性,没有牛顿时间的绝对性。牛顿指出,牛顿时间与外部没有任何关系,以均一的方式流动,是基于直觉的一种抽象,然而,作为当代宇宙学基础的广义相对论表明,这种直觉具有欺骗性。尽管如此,对于人类活动而言,牛顿时间在很大程度上依然适用,只是知道它是“错误的”这个简单事实改变着我们的表征和行动,并潜在影响着历史的演变。在更平常的层面,人类现象就像物理现象一样,拥有自身的时间——即以持续时段来测量的时间尺度。具体到实践学问题,本书在多处都探讨了上述问题。这里,我仅限于就自身时间谱(spectre des temps propres)的两端提出几点补充意见。行动单元的大部分战略的时间跨度都很小,足以评估其成败。如果加大跨度,这些战略将会产生非意向性效应,以部分无法预测的方式改变历史的进程。族群、民族或国家等行动单元的成员相互依存,这些成员的出现、联合和消失构成最典型的历史问题:在历史学家的长时段层面(一个世纪),每一类行动单元如何生存下来?在超长时段层面(一个千年),上述问题会以何种方式呈现于作为整体的族群、民族或国家面前?进化论处理生物圈历史的方式提供了一些思路,正如熊彼特的著作所指出的,在经济学领域,时间尺度更多是被压缩了:创新相当于突变(mutation),竞争相当于自然选择。在现实中,由于人类的自由,选择并不完全是自然选择。20 世纪上半期的地缘政治学者正是因为不了解这一点才会为罪恶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服务。在生物学领域,基因突变源于细胞分裂过程中的复制错误。这是纯粹偶然的结果。在实践学领域,变革是

^① Thierry de Montbrial, « Événements et temps quasi leibnitzien », in B. d'Espagnat (dir.), *Implications philosophiques de la science contemporaine*, t. III, PUF, « Cahiers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 2003.

8

人类的作品,我们从中再次看到行动单元的影响,任何人类作品都包含着自由。或许,人类在地质时间或宇宙时间的维度上注定会消失;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于地质或宇宙时间维度的把握只能借助于数学直觉了。乔治·亨利·苏图(Georges-Henri Soutou)提到“作者带有自由主义和近乎传教色彩的坚实的乐观主义”。我当然不会基于这一坚实的乐观主义而从实践学的角度思考人类的终极命运;相反,更谦虚地将目光转向今后几个世纪。我们可以也应当思考,如何确保地球的可持续发展或演变,否则,人类的事业可能会在出现类似 7000 万年前导致恐龙灭绝的悲剧之前就早早夭折。这就是促使我在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第六章一开始写下下面文字的原因:“这些思考围绕一个理念,即世界(还)不是一个政治单元,不存在一种全球公共物品,因此,国际关系的核心是不同政治单元的公共物品(所有方面的公共物品)的协调问题。”

XXI

总结之前,我简要地探讨几个补充问题。克里斯蒂安·施密特认为,我从弗朗索瓦·佩鲁(François Perroux)那里借用“行动单元”概念的做法很“奇怪”,他指出:“然而,似乎没有什么能够将弗朗索瓦·佩鲁的抒情风格与蒙布里亚尔钟爱的分析模式放到一起。确实,正如蒙布里亚尔指出的,佩鲁是战后关注权力和国际力量对比的极少数经济学家之一。”这正是我借用“行动单元”这个术语的原因,我借用的不是概念,概念是我的创造。在实质层面,我想对阐述基本概念的第一章补充两点。第一点是关于行动单元的结构,包括“文化”和“组织”。需要指出的是,在确立同一性时,结构的两个组成部分可以部分相互替代。换言之,组织的缺陷可以通过文化的优势来弥补,反之亦然。举例而言,尽管存在教廷机构,我们可以认为罗马教会的组织相对薄弱,但教会的同一性建立在一种极为有力的文化基础上,文化的核心就是《信经》(*Credo*)。相反,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加强组织来弥补共同文化方面的缺陷。但我们可以认为,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第二类行动单元还是比第一类更脆弱。第二点是关于占支配地位的单元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我构建了政治问题和国际问题两个概念。占支配地位的单元指什么?一位读者提醒我在书中没有明确这一点。我的回答是:在不同行动单元构成的整体中,一个单元与任何其他单元发生冲突时,它依据自身潜力(参见第二章)肯定能够将对手制服,即让对手丧失行动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单元就处于支配地位。存在多个不同的占支配地位的单元的含义是,一方面,整体中任何其他行动单元都处于被至少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单元的支配之下(依据前面刚刚明确的含义),另一方面,这些

XXII

占支配地位的单元之间不存在支配关系。

我认为最后值得提请注意的是马塞尔·迪瓦尔 (Marcel Duval) 提出的关于冲突分类的建议: “[蒂埃里·德·蒙布里亚尔] 建议将国际冲突分为‘腐烂型战争’和‘蓄意型战争’。我们还希望加上‘误会型战争’或更合适的说法是违背人们主观意愿而突然爆发的‘大范围冲突’, 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主要阶段发生的情况。”^① 在这里, 我强调战争包含的偶然层面, 即发起者可能会走向事先根本没有考虑的方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如此。因此, 战争经常是某种形式的革命, 革命的含义参见前面的定义。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在本书中仔细研究了战争和军事战略, 我还是将重点放在某种和平的国际“治理”的方式上, 同时承认现在实现康德提出的永久和平方案还为时过早。“为时过早”并不意味着“永不可能”, 我所设想的实践学最宏伟的目标之一就是借助于国际法和其他机构逐步实现这个方案。我们甚至可以从欧洲统一进程中看到实现“永久和平三项条款”(trois articles définitifs de la paix perpétuelle)^② 的萌芽。从军事角度看, “彼得斯堡任务”(tâches de Petersberg)^③ 的确定也符合这个努力方向。回到迪瓦尔上将的建议, 我完全接受加上第三个类别, 即使我们可以将“误会型”战争看作“蓄意型”战争的特例。 XXII

本书第一版引发的评论极为丰富, 绝不止这几页纸。我希望今后还有机会深入探讨某些评论包含的理念。

蒂埃里·德·蒙布里亚尔

2003 年 6 月

XXV

① « À la recherche d'une science universelle de l'action », *Défense nationale*, juin 2002.

② 参见 E. Kant, *Œuvres philosophiques*, t. III, Gallimard, « La Pléiade », p. 340 à 353.

③ 1992 年 6 月 19 日, 西欧联盟 (UEO) 成员国通过《彼得斯堡宣言》, 规定其任务是部署欧洲国家武装力量和处理欧洲危机 (人道主义行动、维持和平、干预)。上述任务今天成为欧洲安全和防御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